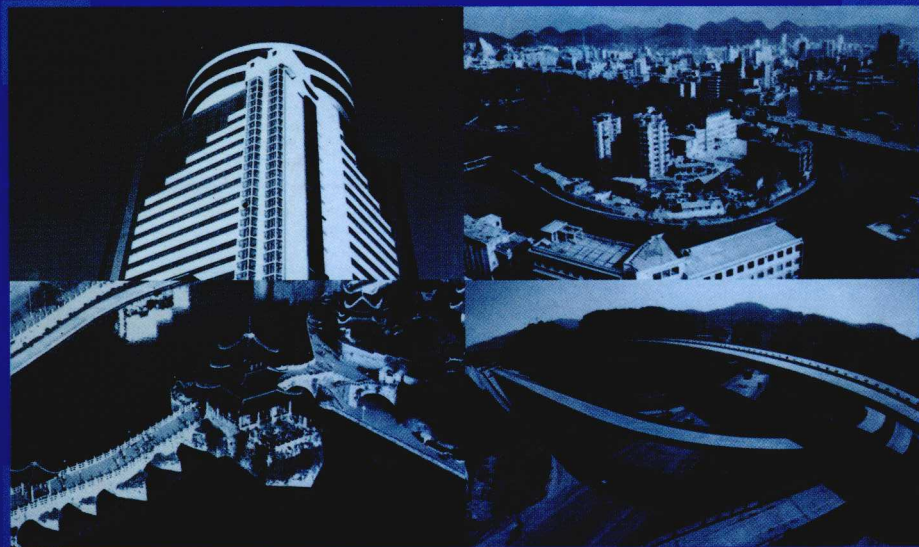


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 编

MOULUE YU XIANCE

谋略与献策

——贵阳市西部大开发“隆中对”



- 谋略篇
- 群言篇
- 献策篇
- 探讨篇

贵州民族出版社

CONSTRUCTION

— 2008 MARKET AND OUTLOOK —



- 2008年 2月
- 2008年 3月
- 2008年 4月
- 2008年 5月

贵阳市委宣传部 编

谋略与献策

——西部大开发“隆中对”

MOULUE YU XIANCE

贵州民族出版社

(黔)新登字 04 号

责任编辑 郭堂亮

封面设计 王 剑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谋略与献策: 贵阳市西部大开发“隆中对” / 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编. —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0. 11
ISBN 7-5412-0941-4

I. 谋... II. 中... III. 西部大开发 (中国) — 研究—文集 IV. F12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2357 号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阳经纬印刷厂印刷

850×1168 mm 1/32 印张:9.25 字数:350 千字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800 册 定价:26.00 元

前 言

经济哲学目前逐渐成为中国的“显学”。这不仅预示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及其哲学将迎来创新高潮，而且显示着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人们对经济问题思考的深化。当中国不仅向市场经济转轨，而且向股份制转轨的时候，从哲学层面审视经济问题，符合人类认识规律，因为，许多在经济学上说不清的问题，只有提到哲学高度，才能获得答案。有论者提出，当代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主要是在经济哲学层面展开的。这话有理。

人们至今对经济哲学界定有争议。查诸文献，广义的或狭义的界说均有，还有介于二者之间者。本书广义地理解经济哲学。在笔者看来，经济哲学就是人们观察、思考和处理经济现象、经济行为和经济理论时所持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它可以以纯粹而系统的理论形态表现出来，也可以作为指导性结构要素，体现在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理论之中。本书论述邓小平经济哲学思想，是在后一种含义上使用“经济哲学”概念的。邓小平经济哲学，主要指存在于邓小平经济理论及其政策举措中的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

生活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任何人，都在日常的经济生活中这

样那样地具有自己对经济问题的看法、评判和好恶，以及处理有关经济问题的方法，等等。因而，任何人也都有自己或完整或不完整或片断的经济哲学思想、观念、观点或看法、感悟等。其中包括任何一种经济理论，也都不能不体现着持论者对其所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的看法、评判和好恶，以及持论者审视它们的方法等等，因而，它们也都不能不渗透着某种经济哲学。显然，凡有经济生活和经济理论之处，均有经济哲学。

《资本论》译者之一王亚南先生在说明经济学与哲学的关联时讲过：“哲学的法则，成为经济学的方法论；经济学的法则，又成为这一总的法则之一特殊侧面的具体化”，“科学的经济学建立的时候，正是科学的哲学体系在经济学这一范畴完成和树立的时候”；“最初，经济学是混在哲学领域中研究的。我们先看两者成立的历史：自有希腊哲学以来，至今约二千五百年；而经济学的成立，自威廉·配第至今约二百五十年，自亚当·斯密起，则只有一百七十年光景”，“哲学成立的历史，竟较经济学要长十倍乃至十余倍”，“在经济学前史期，所有经济思想，只有到哲学中去寻找”，在经济学成立以后，经济学者也离不开哲学。为什么对经济问题的思考处理也离不开哲学呢？这是因为，“无论任何社会，经济生活总为人类生活的基础”，是“哲学者不能不涉及的部分。从实践的立场来看，无论国家或私人间的利害关系，向以经济的利害为主，使哲学者不能不解答国家或人民的许多经济上的实际问题”，同时，“经济学正如其他任何科学一样，它所研究的对象，是事物的因果法则”，而这“也就愈益导向对事物因果法则研究的要求与兴趣”，亦即导向经济哲学^①。应当说，王先生的论析有道理。既然在历史上，经济学出发于哲学；同时，既然在逻辑上，经济学也只能从一定的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出发，那么，经济

^① 《王亚南经济思想史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63~65 页。

理论中经济哲学的不可或缺性及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的了。

国内外经济哲学和比较经济哲学研究状况略说

本书主旨不是一般地研究经济哲学，而是力求开拓关于邓小平经济哲学的比较研究。在比较中研究不同的经济哲学体系或观点、方法，借以形成更全面更完整的经济哲学，或者力求加深对某一种经济哲学体系真理性和正当性的理解，或去揭示其缺漏，是“比较经济哲学”研究的旨趣所在。本书着力于加深对邓小平经济哲学出发点的理解。

经济哲学实际上也是任何经济学体系的价值始发点和方法论依据；任何一个经济学理论体系，均是某种经济哲学的逻辑展开。经济学发展过程，同时也是经济哲学不断创新突破的过程。就大者而言，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国外围绕经济哲学基本问题，曾前后有过四次较大争论，均引起了经济学的飞跃。

其一，是19世纪80年代后的方法论论争，以奥地利学派抽象演绎法和德国学派历史归纳法为两方，笔战数十年。作为其侧面，当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误解马恩价值理论，拒斥奥地利学派的边际效用论，但也未能阻止“边际革命”的发生和深入推进。正是这一革命，为资源优化配置的市场经济模式基础性地位提供了根本性理论证明，说明逻辑方法也可弥补历史方法的某些不足。实际上，马克思当年已提出了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则。目前，人们已经共识于两者的统一综合。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上的这种共识，至今发挥着重大作用。其中包括，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往往在史实上或逻辑上总可能有一些“缺环”。在这种情况下，逻辑“缺环”可以通由史实加以弥补，同样，史实

的不足亦可通由逻辑方法来推导。“历史—逻辑”互换互补方法，至今神通广大，不可小视。

其二，是20世纪30年代后的“方法论革命”，包括西方各国鉴于经济危机而学习社会主义计划方法，促成凯恩斯主义的出现以及数理科学对经济学的进一步渗透。反对完全计划经济的哈耶克、米赛斯以及初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奥·兰格等人，这时都在数理经济学及其哲学层面上提出了至今有用的分析；关于市场与计划作为配置资源的中性手段的看法，关于从哲学认识论的层面论证计划经济的非科学性和市场经济的可行性及其局限等等，也大体是在这个阶段形成的^①。

其三，是本世纪50年代开始的“经济学假定大战”，美国两位诺奖得主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分持帅旗，鏖兵论坛。从经济哲学看，这次论争可以说只不过是历史方法与纯逻辑方法论战的继续和深化。西德舍夫勒于1955年推出《经济学的失败》一书，根本否定假定—演绎传统，提出经济学家首先要研究整个社会结构及其历史。1958年，帕番德里奥推出《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与之辩驳，深化了“模式”和“理论”的区分，具有重大意义。1962年，罗宾逊夫人又推出《经济哲学》一书，对经济学价值观前提多所论析，并把它与意识形态相关联，在理论上也确有新见。此时，西方许多经济学家反对完全计划经济模式，力主市场经济，批评经典的“劳动价值论”，深化边际效用价值论，虽走向片面，但确含合理成份^②，也未可全盘否定。

作为这次论战的深化，本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经济学界，不仅“假定大战”烽火再起，而且出现了布劳格的《经济学方法

① 见拙文《西方学者的“市场与计划中性论”述评》，《经济研究资料》1993年第1期。

② 见本书第二章。

论》(1980年)、《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1980年),以及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和萨缪斯主编的经济学方法论论文集、奥肯的《平等与效率》(1975年)等书,提出了经济学必须借助当代科学哲学成果,对经济学“假定”的实践检验规则(证实或证伪)、数理方法用于经济学的界限等等,均有所展开和深化。诺奖得主库普曼《关于经济学现状的三篇论文》还揭示了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般结构是“假定+推理系统”,明确提出在经济科学研究中应当注重把推理的链环与对假设的设定分离开来。库氏的成果,实际上给经济哲学在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给出了进一步显示。因为,在经济学理论中,作为论者价值选择的“假定”,实际上只能是一种经济哲学。显然,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均只能以某种经济哲学作为自己的逻辑出发点。

其四,近一二十年,以诺奖得主科斯为代表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包括“产权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法和经济学”等流派)学者,在坚持西方主流经济学以效率标准为首要尺度的合理性时,反对它只注目资源配置的生产力方面而无视经济制度及上层建筑因素以及无视经济发展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的缺漏,致力于研究法律、习俗、社会稳定、行为规则、政府和经济制度在资源配置优化中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政治经济学全面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性视角。它含纳的经济哲学内容已经和正在引起当代许多学者的关注。特别是,当服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设计的苏东“休克疗法”在彼地引起灾变,而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倍受注意,并被一批年轻的经济学者结合中国改革实践引申为“过渡经济学”时,当邓小平同志关于在社会稳定和“三个有利于”的前提下渐进地推进市场化改革的思路(包括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效率是首要尺度以及社会稳定可以减少市场交易成本的理论异曲同工,新制度经济学相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哲学优点对中国人

就更加显豁。作为这次论战的侧面，未来学中悲观主义的罗马俱乐部所倡经济“增长极限论”，与美国乐观主义者托夫勒、西蒙等人的“无限制增长论”的较量，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形成推广，发展经济学中缪尔达尔“不平衡增长”模式与“平衡增长”模式的论争，福利经济学中“平等至上论”与主流经济学“效率第一论”的分歧，以及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对古典“劳动价值论”的纠偏，等等，看来也均和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形成及其经济哲学的发展有某种对应。如果我们把邓小平经济哲学的比较研究，放在上述四次论战特别是第四次论战的背景上进行，不仅看到它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全面考察社会—经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继承，而且还要看到它由此与当代新制度经济学有所契合呼应的特点，把它看成在当代市场经济和科技革命条件下借鉴了人类最新经济学—哲学成果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那么，便会对它产生一种崭新的理解和感受。一些邓小平理论研究著述较少这种视野，确待弥补完善。

既然任何经济理论均体现着某种经济哲学，同时，既然任何哲学均不能不这样那样地涉及人类经济生活问题，那么，当人们对不同的经济哲学、经济学及其哲学或哲学及其经济学（体系或观点）进行比较研究时，“比较经济哲学”事实上便产生了。尽管时至今日，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比较经济哲学”研究都还是一个相当新颖的论域。

以我之见，当代国外比较经济哲学研究，首先是在经济学家比较研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取得成果的。其中大体又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一些学者出于学术探讨，用当代数理经济学等知识，对比研究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各自的优劣，借以完善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在这种研究中，“市场和计划中性论”、“股份制中性论”以及“股份制社会主义”、“福利经济学的社会主义”等理论被提出并被论证，

其中有的已被我国批判借鉴汲取，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股份制社会主义”的理论源头之一；其二，是一些西方政客或政客化的学者借用当代比较研究成果，诬蔑和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当然不能认同。在前一类学者的学术探讨成果中，据我所知，除了本世纪30年代米赛斯与兰格等人围绕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的大论战而外，作为国外大学开设的课程之一，“比较经济体制”（又译“比较经济制度”）是当代比较经济哲学研究中硕果累累的又一论域。之所以视之为关于经济哲学的比较研究，主要是因为，它和30年代的那场大论战相似，实际上是在哲学的层面上比较研究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的；它对市场经济必然性和必要性的论证，对完全计划经济弊端的说明，等等，均在认识论（包括信息机制，决策机制等）或历史观（利益驱动机制或价值选择等）层面展开，带有十分强烈的经济哲学色彩。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80年代曾推出“当代经济比较研究丛书”，其中也包含了一批当代国外比较经济哲学研究的成果，值得注意。美国的比较经济体制研究成果，译介到中国者，首推1976年出版的埃·纽伯格等《比较经济体制》教科书^①，以及阿·格鲁奇的同名巨著^②。其中，前者所用“DIM方法”（即分别比较考察经济体制的决策结构、信息结构和动力结构，然后综合地作出结论）及其对市场经济必然性的证明，对完全计划经济弊端的揭示，是比较深刻的。两书也都对世界主要国家（包括中国）的经济体制进行了某些比较研究，其中，对中国的概括不仅不准确，且显然过时，但其理论结论有值得参考之处。当然，这两本书的哲学架构，并非在十分明确的哲学认识论或历史观层面上展开，而是选择了介于哲学与当代信息论和心理学之间的某种具体模型，因

^① 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而，其经济哲学含义还有待显化，而且在经济哲学上应展开进一步论说的一些重要问题也被忽略了，淡化了。有鉴于此，本书的比较研究则倾力于最高层面的经济哲学问题，首先是作为经济方面价值尺度和真理尺度的生产力标准，它与平等人权尺度的关系，以及股份制中的“所有制唯物主义”问题，等等。在我看来，先厘清了最高层面的这些哲学问题，其他问题并不难解决。

邓小平经济哲学也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深层哲学结构。从广义看，国内外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评论，往往也含有对邓小平经济哲学的某种评判。从狭义看，虽然国外至今尚无关于邓小平经济哲学研究的有分量的专著，但1992年以来，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却方兴未艾。这不难理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和股份制彻底转轨，无论在历史上和逻辑上，人们从经济哲学层面思考问题均应是占先的事情。

在国内，如果说邓小平理论是在论争和实践检验中逐步占上风的，那么也可以说，人们对邓小平经济哲学的学习、理解和研究、宣传，也是在与落后蒙昧力量的斗争和实践检验中逐步展开并深入的。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主张“市场中性论”、“股份制中性论”及由此引起的改革新潮，促使人们从哲学高度审视经济问题，于是，在党中央号召学习邓小平理论的热潮中，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传入中国并催生“过渡经济学”相对应，大陆学术界对邓小平经济哲学的研究、宣传进入新阶段。事实表明，大陆有创见的经济学家，大体上均是首先从经济哲学层面打开局面的。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成为他们共同的哲学标志。例如，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在经济伦理学方面的耕耘，包括他对当代中国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见解，对产权交易问题的探讨，对“股份制中性论”和“股份制社会主义”的具体剖析，对西方福利经济学的述评，对经济发展中环境代价问题的研究，等等，实际也可

以被看成是对邓小平经济哲学的一种深层次展开和呼应^①。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等结合中国改革实际，论说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优化的功能难以取代以及“股份制社会主义”，不仅常常在经济哲学层面上展开，而且实际上也是对邓小平经济哲学许多根本性内容的呼应、深化和学理化。樊纲先生《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张雄先生《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世界》，董德刚先生《社会主义经济哲学引论》，曾昭宁先生《公平与效率》以及王福霖先生、许崇正先生研究经济伦理学的著述，等等，也均大体如此。曾德盛先生《毛泽东经济哲学研究》，则给邓小平经济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历史前提和比较对象。目前，大陆东南地区一些刊物已开辟了经济哲学专栏，沪宁地区也多次举办有关研讨会，上海哲学界和经济学界尤其显得活跃。

最近两三年，国内经济哲学研究的新潮，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及其哲学倍受青睐。一批留学回国的年轻学者，在新潮中力求恢复政治经济学传统，恢复观察社会的整体视角，倾力于在经济哲学的层面上批判借用新制度经济学以说明中国改革进程，包括解释邓小平同志改革的渐进策略、以社会稳定为前提的选择和通过股份制实现社会主义的构思，以及在抓经济的同时抓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的原则，等等，并力求挖掘西方经济学与中国道家哲学的关联，力求进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过渡经济学”学派，等等实际上也可被看成对邓小平经济哲学和党中央决策的呼应、阐述和学理系统化。尽管其中有些人的有些见解和提法尚可再议，但他们确乎是邓小平经济哲学研究、宣传中的一支有生力量。台湾淡江大学教授曾庆睐先生新著《功利主义新论》^②，借鉴新制度经

① 参见厉以宁《经济学伦理问题》及所附《厉以宁有关经济学伦理问题的著作目录》，三联书店1995年版。当然，其中“就业优先论”等尚可再议。

②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济学方法，以效率优先下的公平为出发点，构建了一个有自己特点的经济伦理学形式化体系，并自称“第一个来自台湾的社会主义者”，也值得重视。作为产权经济学权威之一，香港学者张五常先生力主中国企业私有化，受到大陆年轻学者程恩富先生的狙击。这一场论争也首先是在经济哲学层面展开的。

1992年后，国内围绕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及党中央关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指向，发生了一些争论，其中也包含着对邓小平经济哲学的不同看法。少数论者学风不正，离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实质是以经典马克思主义著述中的片言只语为据批评邓小平理论^①。针对这种思潮，我国一些论者起而辩驳，实际上也是对邓小平经济哲学的捍卫。

目前，国内学术界还以市场经济模式比较研究、国内外经济学比较研究等形式，推出了一些多多少少包含着比较经济哲学研究内容的论著。其中有的在哲学上显得粗浅，“形而下”的成份较重。在我的印象中，以邓小平经济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为专题的著作，似乎国内目前还没有。

对邓小平经济哲学思想进行比较 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邓小平经济理论及其哲学思想的孕育和诞生、发展，一方面不能不面对国内以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表现出来的“左”的倾向。这种倾向囿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否定市场经济的取向，步步为营，持续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股份制改革，实质上表现着过时的落伍的经济哲学对新的进步的经济哲学的阻滞挑战，因之，

^① 参见本书第五章。

急需从经济哲学的层面突破前人的过时取向，说明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和股份制的真理性和正当性；另一方面，它又不能不在批判汲取西方学者关于市场经济和股份制无可替代性论证的同时，回击全盘否定社会主义的思潮。从二十多年的实践看，对于计划经济体制及其理论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中国而言，要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必然导致的“股份制社会主义”真正在人们的思想深处被认定为正当合理，为中国当前的改革开放及其深入扫清思想深处的障碍，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建设任务，便是在经济哲学层面，比较研究邓小平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的同异，说明邓小平对他们的继承和发展、突破。只有完成了这一任务，邓小平经济理论，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股份制社会主义”等等，才会获得足够的真理性和正当性的证明，从而不会再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看待，使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获得最深层关键理论的有力支持。与此同时，在比较研究中说明邓小平同志批判借鉴西方某些成果的合理性方面，不仅可以使人们感受到邓小平经济理论及其哲学是与当代经济理性最前沿的科学因素相契合的，而且，也可进一步澄清人们的误会和误解。十分显然，中国当代改革开放的实践，要求我们展开对邓小平经济哲学的比较研究。

以毛泽东主席《实践论》为根据，中国当代哲学研究以传统主客体模式为主流，一方面的确拓开了某些新的学术“操作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在革命实践中更是绩效辉煌；另一方面，由于传统主客体模式一般在始发点上未把生产力发展以及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辩证统一关系作为“内生变量”，所以，它在当代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中显得多少有些脱离社会现实，“冷得发抖”。我国金朝诗人耶律楚材有诗句曰“谈玄能说虎狼仁”^①。移

① 《寄德明》。

用这句诗评论我国当代的主客体哲学认识论，也颇恰当。事实上，这种主客体认识论哲学，离开生产力决定性原理和生产力标准，在过去确实曾经为计划经济作过哲学注解，至今在某些教条主义者那里仍然是反对市场经济的哲学工具，早已落伍于时代，更难承担指导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大任。许多哲学工作者已经明确省悟到了这一点。显然，在传统主客体认识论模式之外，在市场经济及其上层建筑的综合中，在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综合视野中研究哲学，也已成为当代中国哲学走出学术困境、进而现代化的一条出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哲学界也表现出对经济哲学的巨大兴趣。哲学界和经济学界合力注目经济哲学，注目邓小平经济哲学及其比较研究，把邓小平理论研究推向现代化和深化，更全力地服务于改革开放，确是大好事。

形成于一个半世纪之前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按照当时时代的要求，只能首先注目于“剥夺剥夺者”，号召在资本原始积累中受害的广大工人群众奋起夺权，建立新社会。它的主旋律是“革命”，是砸碎旧的国家机器，是掀翻整个旧制度。一百五十年过去了，世界已经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中国也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成功地进行了二十年改革开放。目下，中国人面临的当务之急，再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尽快实现现代化，实现国强民富。十分显然，以“革命”为主旋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某些方面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当代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需要。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亟需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作为指导。在当代中国，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建立，无论是以学术论著的形式出现，或者是在实际工作中以政策举措的形式存在，实际上均离不开邓小平经济理论及其哲学这样那样的指导和影响。在经济哲学层面上比较研究邓小平理论与经典作家的同异以及与西方经济学的契合，

也是为有中国特色现代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建设预作哲学准备。

俯视寰球,从本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环境污染和能源危机开始,几十年以来,世界许多有识之士也均极端关注经济哲学问题研究。在未来学领域,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悲观主义与托夫勒等人乐观主义的论战,其实就是当代的一次经济哲学大争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及其被全球广泛认同,实际上也是世人对传统经济哲学反思和扬弃的结果^①。近年,随着苏美冷战的结束和东亚“四小龙”的腾飞、中国高速推进,以及亚洲金融风暴的显现,在全世界,从价值选择(或文化)层面反思和重建经济哲学,又成为时代潮流。布热津斯基(美国前国务卿)在新著《大失控和大混乱》^②中便指出,前苏联的解体并不意味着西方文化的全面胜利;在西方,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盛行,表明启蒙学者以来的西方人道主义哲学是浅薄的,应予反思,也应当提倡个人对于社会的义务和俭朴的生活方式,等等。对发展政治学多所建树的美国学者亨廷顿,则把来日世界冲突之源归结为东西方文化斗争,虽有片面之嫌和冷战意绪,但其从文化层面提出问题,确也体现了哲学重新被重视的时代潮流。当此世纪转换之际,当克隆技术和“深蓝”式人机“大战”已经提出了许多紧迫的科技伦理问题,当西方发展缺乏后劲与东方经济高速推进形成鲜明对照但目前情况又有逆转的时候,当东西方文化比较已经成为世界趣味中心之一的时候,经济哲学成为世界“显学”,当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因为,人类处于发展的转折关头;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学科逻辑上说,在这个转折关头,从经济哲学的层面进行回思和前瞻,都是必然占先的事情。哲学的导向功能,也只有在这种大转折中,才

① 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

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